



TONGYI ZHANXIAN
RENWUZHI

统一战线人物志

第2卷



本书编写组◎编著



华文出版社

统一战线人物志

(第2卷)

本书编写组 编著

 华文出版社

《统一战线人物志》 编审委员会名单

主 任 刘延东

副 主 任 李德洙 胡德平 朱维群 黄跃金

楼志豪 陈喜庆 斯 塔

成 员 (按姓名笔画排序)

王永庆 边巴扎西 安七一 庄聪生

杨启儒 周 宁 林智敏 殷晓静

常荣军

目 录

胡愈之	441
卫立煌	455
胡子昂	467
屈 武	479
周谷城	493
刘 斐	505
楚图南	519
钱昌照	533
董其武	545
史 良	557
严济慈	569
沙千里	581
黄鼎臣	591
谢雪红	603
童第周	615
王昆仑	627
周培源	641
刘靖基	653

苏步青	663
侯镜如	675
巴 金	687
朱学范	699
苏子衡	713
孙晓村	723
赵朴初	735
程思远	747
费孝通	759
华罗庚	773
安子介	787
卢嘉锡	799
荣毅仁	811
蔡 啸	825
蔡子民	835
霍英东	847
李沛瑶	861
王 选	871
班 禅	883
后 记	895

胡愈之

(1896 ~ 1986)



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等职。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届中央代主席。

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胡愈之，字子如，笔名伏生，曾用名胡学愚。1896年9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县城（今为丰惠镇）一个书香世家。

胡愈之的祖父是个翰林，做过清朝的京官御史。其父是个典型的清末民初维新派知识分子，不爱做官，却乐于在家乡为社会服务，创办起新式学堂和女子学校，同情并帮助贫苦农民，不仅对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卖掉了所有田地，把财产用在公共事业上。这些给幼年的胡愈之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他在谈到父亲时说：“至今对于我的品格和趣味影响最深的，依然是我的平凡的父亲。我的父亲做到了极平凡的伟大。我极渺小，我没有做到我父亲的伟大，但我学到了我父亲的平凡。”

1902年，胡愈之进入私塾学习，不久又入县里新设的高等小学堂，至14岁毕业。按当时的规定，小学堂毕业，就取得了秀才的资格。1911年初，胡愈之离开家乡去考绍兴府中学堂，学制4年，读完4年即可取得举人资格。学堂分设文、实两科。胡愈之对数理有兴趣，因而考了插班二年级实科生，成绩为第一名。因鲁迅时任该校学监并兼授生理卫生课，胡愈之在此和鲁迅结下师生之谊。下半年，胡愈之患了伤寒病，近乎丧命，不得不休学养病。1912年胡愈之病愈后转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想学好英语，更多地学习欧美的文化知识。但年末学校停办，学习又因此中断。1913年，胡愈之拜绍兴名宿薛朗轩为师专学语文，同时继续自学英语，还参加了世界语的函授学习。

1914年，胡愈之告别学生生活，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被分在理化部工作，主要是编教科书。这时的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胡愈之非常满意这一工作，他从小就是个“读报迷”，曾与弟弟试编过家庭报刊，内容有论文、小说，并配有插图，坚持出了四五十册。胡愈之做练习生参加编书，跑印刷厂，很快便熟悉整个出版工作过程，这为他后来在新闻出版业的卓越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愈之除了编书还试着用自学的英文、日文为《东方杂志》刊物翻译一些资料。工作之余他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刻苦自学，他曾说“我只有中学二年级的学历，我读书都是在‘商务’读的”。1915年胡愈之成为《东方杂志》编辑，翻译和写作了许多文章，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编译能力，还接触了许多新知识，受到各种外来思想的影响，开始思考和研究各方面的问题。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受当时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后又读托尔斯泰的书，使我成为一个赞美人类爱的理想主义者、唯心论者”。

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胡愈之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启蒙与促进的作用。这期间，他和茅盾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他们都热衷于新文化运动。胡愈之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我和沈雁冰都喜欢写白话文，写了文章就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去登载。‘五四’时期我和沈雁冰是提倡白话文最力的两个人”。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大罢工，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职工也一起参加了罢工，声援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后，胡愈之更加努力译著，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连续撰文，发表了不少文章。内容涉及文学、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和哲学思想等各领域。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联系了一些世界语学者，创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发表了许多评介外国文艺名人的文章和文艺评论，为当时的中国文艺界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同时，为发展家乡上虞的文化事业，他和弟弟胡仲持办起了上虞第一份报纸《上虞声》，旨在向家乡人民宣传介绍新文化思想。报纸内容丰富，受到当地知识界的欢迎。1920年，胡愈之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除了写作投稿外，还协助郑振铎编辑《文学旬刊》。1923年，胡愈之开始转向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这一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60多篇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1924年《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由胡愈之具体负责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库》，共100册。

二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已经成为运动的骨



干力量，胡愈之积极投入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行、集会和罢工，并对运动发展情况进行采访和报道。他与爱国知识分子郑振铎、叶圣陶等“商务”的同事一起，集资创办了《公理日报》，如实报道五卅惨案的真相，宣传反帝爱国，成为反帝爱国的舆论阵地。他还编辑《东方杂志》五卅临时增刊，并撰写《五卅运动纪实》长文，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群众革命斗争的起因和发展过程，指出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1926年，章锡琛办起了开明书店，由于胡愈之为书店拟定编辑方针，组织书稿，被章锡琛称为书店的“参谋长”。

1927年3月，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胡愈之经历了这一斗争，他看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心情十分振奋。他被推为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个时期，读了一点马列著作，也结识一些共产党员，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抱有深刻的同情。但我对国民党仍抱有希望，从我的思想来说，仍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胡愈之思想上极大震动，打消了对国民党的希望和幻想。4月13日，他亲眼目睹了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暴行，基于对这一暴行的义愤，当晚他就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人一起签名，寄给既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又是上海政治分会委员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三人，后将原稿发表在《商报》上。这一行动后来被周恩来同志赞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这份《抗议书》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收藏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又是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实际斗争中，胡愈之的思想、立场日益转变，倾向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由于他写抗议信声讨四一二大屠杀，遭到反动派的仇视，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他于1928年1月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派员身份流亡法国。

三

到法国后，胡愈之得到法国世界语团体帮助，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同时还到巴黎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新闻。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

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他积极参加世界语活动，由于法国参加世界语运动的大都是觉悟的工人群众，这也使他能够直接深入地了解法国社会民众的生活状况。他作为中国的世界语学者，1928年，参加了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国际世界语大会，1930年，又出席英国牛津世界语大会。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世界语是国际交往的有力工具。作为《东方杂志》的特派员，他经常写一些评论和通讯，从国外寄稿给国内，所得稿酬用以维持在法国的生活。1930年后，法郎增值，胡愈之在法国的生活费用难以为继，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涯回国。

1931年1月初，胡愈之离开法国，途经德国和波兰，做了短期参观访问后，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达莫斯科，进行了7天的访问。他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国营农场、商店和学校，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拜谒了列宁墓，参加了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会，接触到工人、农民、学生、作家、教授等各方面人士。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社会状况，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见闻使他写就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胡愈之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他写道“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别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他真正感到了“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认识到未来的世界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这些感想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从1931年8月这一新书出版到1932年10月，一共再版5次，可见其畅销程度。

1931年2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仍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东方杂志》、《社会与教育》写了一些呼吁抗日救亡的文章。同时在邹韬奋的约请下，为《生活》周刊撰写了许多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评述，积极宣传抗日。胡愈之和邹韬奋也在这样的共同战斗中建立起亲密友情，共同创办了生活书店，后来又把生活书店改组为出版社。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胡愈之在上海闸北的居舍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和印刷厂都被炸毁。此时，胡愈之正患伤寒病，只好回到上虞老家养病，直到5月病愈后又回到上海。正巧法国在上海办的哈瓦斯新闻通讯社招聘编辑，他被推荐，成为中文部编辑。8月，商务印书馆复业，恢复了《东方杂志》的出版，胡愈之任主编。1933年1月，胡愈之因在《东方杂志》新年号中组织“新年的梦想”专栏，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讽刺，引起了商务



印书馆领导的不满，将其辞退。同年年初，胡愈之应鲁迅之邀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会委员，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1933年9月，胡愈之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归党中央特科领导。作为特别党员，只与共产党员个人发生单线联系，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也不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主要任务还是为党做情报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胡愈之在党的领导下，在生活书店先后筹划创办了《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多种进步刊物，并亲自主编《世界知识》。这些刊物在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的情况下，对形形色色反动的思想文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教育团结广大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他推动生活书店出版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影响了一批青年投向革命。在《生活》周刊遭受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他又积极推动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使之成为《生活》周刊的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宣传抗日，并通过杜重远做争取东北军上层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这对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胡愈之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上海各界成立救国会的活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于12月逃亡到香港。1936年2月，受党组织的派遣，他经法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4月返回香港。胡愈之协助支持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任该报主笔，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努力促进国共合作。在香港，胡愈之受潘汉年的指示帮助起草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后来由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复函支持他们的意见。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胡愈之与宋庆龄、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等当选为救国会的领导人。8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从事支持救国会的活动。10月，鲁迅先生因病去世。胡愈之和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商讨决定：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鲁迅先生的葬礼，通过鲁迅先生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胡愈之成为这一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10月22日，蔡元培、宋庆龄参加了隆重的葬礼并讲话，胡愈之在葬礼的最后宣读了悼词。追悼会后，群众举行了争取国内民主和抵抗日本侵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体现了社会各界人士要求团结一致，联合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南京政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胡愈之得到消息后立即担负起声援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他一方面组织律师为“七君子”辩护；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工具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他与被关押在狱中的“七君子”内外配合，设法将有关的消息传达给他们，确定斗争的对策，协调抗日救国的一致立场和原则。他采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日爱国志士的反动行径，增加了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他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动了“救国人狱”运动，发布了《救国人狱运动宣言》，并陪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自请入狱，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这场斗争最终以国民政府被迫无罪释放“七君子”而结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组织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作用。1937年初，在反动统治严密控制文化界的恶劣环境中，胡愈之创办了一本大型综合杂志《月报》，以翻译和转载国内外进步报刊文章的形式来宣传革命思想；起到很好的作用。8月，他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继续利用宣传阵地出版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救亡日报》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郭沫若、潘汉年与上海文教会协商创办的。文教会中设立了一个“会报委员会”作为《救亡日报》的领导机构，胡愈之是这一领导机构的成员。他辛勤工作，多次为报纸写下重要文章。工作中他与夏衍亲密合作，建立了战斗友谊，共同成为党在上海工作的文化战士。这一时期，胡愈之还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后又成立国际新闻供应社。利用租界“孤岛”特殊的条件，组织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1937年10月9日，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胡愈之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会上周恩来作了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号召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周恩来的讲话给了胡愈之极大的鼓舞。同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中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撤离。胡愈之坚持留在上海，不能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他就以隐蔽的方法来报道抗战消息，并深入到群众中去；对难民、市民和工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胡愈之筹集资金，成立“复社”，以极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西行漫记》，为国内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愈之组织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1938年5月，胡愈之来到武汉，受周恩来之邀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胡愈之利用自己与新闻界的关系，推动建立了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他鼓励愿意投身抗战新闻事业的青年到前线去担任新闻记者，写回战地通讯，向国内外记者发布，真实报道中国抗战情况。武汉沦陷后，受周恩来同志指派，他到桂林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继续主持救国会工作的同时，团结领导撤退到桂林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通过继续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多种活动形式，使桂林很快成了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他于1940年7月撤离桂林到达香港。

四

在香港，胡愈之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联系后，按照周恩来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协助陈嘉庚先生办《南洋商报》，就任该报编辑主任。他每天为报纸写社论，依靠设在香港的国际新闻社为《南洋商报》提供国内的抗战消息，使该报成为团结华侨抗日救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阵地。胡愈之在报纸言论发表中特别注重公正客观，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团结，拥护抗战救国。由于宣传方针正确，能够代表南洋华侨的心声，销路也大增。在主持《南洋商报》工作期间，胡愈之与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结下了亲密的友情。除办好报纸，胡愈之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组织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任副团长，在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工作。接着在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中任执行委员和宣传主任，动员组织华侨武装抗击日寇的斗争。

1941年6月，胡愈之与受周恩来派遣调往新加坡协助其工作的沈兹九结为革命伴侣。此后，他们相依相伴，始终生活工作在一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西亚，新加坡危在旦夕，他和郁达夫、沈兹九、王纪元、张楚琨等爱国文化工作者撤离新加坡，流亡到

印尼苏门答腊。流亡期间，他写了《少年航空兵》一书，憧憬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他还进行印尼语研究，编写了《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著作。为了维持生活，胡愈之、沈兹九等办起了酿酒厂和肥皂厂，以解决流亡生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创办了《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和《南侨日报》，建立起“新南洋出版社”，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侨胞共同为争取祖国和平民主而斗争。中共方面十分支持他的工作，后来派夏衍来新加坡担任《南侨日报》的主笔。胡愈之与香港和国内文化界取得广泛联系，并聘请一些他所熟习的新闻界的朋友担任报刊的特约编辑，使华侨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内外局势，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为开展盟务，“得于各省或特别市及海外设立支部”。胡愈之受民盟中央的委托，负责在南洋发展民盟组织。1946年1月，民盟南方总支部成立。不久，胡愈之就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了民盟南方总支部驻新办事处。由于南洋民盟组织的建立，把当地爱国、进步的华侨都吸引过来，成为海外反对美蒋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力量。随后，他又领导和组建了民盟马来西亚支部，被选为支部主任委员。

1948年4月，胡愈之赴香港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后留港从事文化和统战工作，担任人民救国会的秘书长。同年夏，他奉命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途中提出国民党已失去人心，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两年。毛泽东对这一看法很重视。

1949年2月，胡愈之到达北平，作为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参加新闻出版部门的接管工作。1949年6月，他着手筹办《光明日报》并任总编辑。他为报纸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呼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为建立和平、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团结奋斗。9月，他被聘为新华书店总编辑，负责出版工作。后来以人民救国会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五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被任命为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他致力于加强人民政府对出版事业的领导，促进全国出版队伍的团结合作，贯彻“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出版方针。1949年11月，筹划出版了《新华月报》，他函请



毛主席为《新华月报》题词，拟定《新华月报》编委会组成名单，亲自撰写《新华月报》创刊词。他要求一定要出一本最有权威性的刊物。在出版总署的统一领导下，全国的出版事业逐步发展。1953年4月，倡议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1月，出版总署被撤销，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出版工作。1961年，文化部决定编辑出版《知识丛书》，由胡愈之负责。他组织专家学者和六家出版社编辑部撰写各种选题，发动各学科一流专家为丛书撰稿，到“文革”开始前共出版了30多种。1962年，他主持农村新历书《东方红》的编辑出版工作（80年代以后易名为《农村年书》），这个通俗易懂的知识性读物出版后，受到了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

胡愈之早年曾提倡汉字改革，此后，一直为推进文字改革而不懈努力。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后，团结许多热心于文字改革的语文专家，深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考察文字改革工作，侧重于拼音方案的确定，了解普通话推行情况，为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愈之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和接待国外友人来访，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展民间外交做了许多工作。1949年1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他被推为副会长。1954年11月，胡愈之作为特邀代表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胡愈之组织筹备成立了中国印尼友好协会，被推为副会长。1956年6月，他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1959年，他再次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960年和1962年胡愈之先后被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他先后出访了印尼、缅甸、尼泊尔等国家。1962年10月，日本社会党议员代表团来华，胡愈之作为我外交学会代表团团长，与该团就如何促进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胡愈之从1949年2月到北平后，就参与民盟领导层工作。3月，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他担任临工委的委员，开始民盟组织的整顿工作。11月至12月，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和五中全会上，胡愈之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委。1950年5月，胡愈之任中央土改工作总团副团长，和一批民主人士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1952年胡愈之作为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盟中央临时文教工作组的成员，组织知识分子政治理论学习。由于民盟成员多数在高校从教，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影响了部分教师的实际利益，使他们在思想上不免有些想法，他便深入清华、北大等院

校,认真听取盟员教师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学习讨论。1953年胡愈之在民盟一届七中全会上被推选为民盟中央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56年1月,胡愈之在广泛调查了解知识分子情况的基础上,主持草拟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及《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这份报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情况,建议适当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增加他们的居住面积,发挥他们的专长,全面规划专门人才的使用,等等。并建议党政领导发扬民主,多听意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思想教育。这两份建议得到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重视,为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党和国家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中得到了体现。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民盟中央因“章罗联盟”问题受到严重冲击。民盟一些与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和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也因反右斗争扩大化受到了伤害。1979年,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愈之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在报告的最后,胡愈之以个人名义承担了他自1953年以来,特别是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长期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期间工作中所执行的“左”的错误,诚恳地向因此受到政治牵连和不公正待遇的盟内同志道歉。与会同志对此极为赞赏和感动。

1958年11月,胡愈之在民盟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不再担任秘书长。1960年7月,民盟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组织形势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当时把采取这种方式的会议通称为“神仙会”,胡愈之是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同年12月,在民盟中央召开的基层工作会议上,胡愈之作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讲话。1963年12月,民盟三届四中全会决定秘书长一职由胡愈之兼任,他又重新领导民盟中央日常工作。1964年,民盟中央决定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学习委员会,胡愈之任主任委员,负责组织对盟员的“三个主义”的学习和教育,同时承担民盟中央日常工作。他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广大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努力发挥他们在建设祖国中的重要作用。同年,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组团赴河北霸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作为民主党派参观团领队参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盟中央被迫停止办公。胡愈之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深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对